

黄岩文史资料通讯

(请予传阅 核实指正)

第 五 期

黄岩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五月

目 录

策动黄岩起义的经过.....	毛静如(1)
黄岩起义的前夜.....	王维积(5)
回忆王公季梁.....	王帽英 王天寿(7)
许植方教授史料.....	王立干 郑涤心等(10)
黄岩柑桔病虫害发生与防治历史的演变.....	任伊森(17)
我县最早的沼气瓦斯灯.....	胡桂春(28)
晚清以来黄岩中医人物传(二).....	陈梦贵(28)
辛亥革命后黄岩县知事、县长任期表.....	林桂琴(32)

(见《黄岩文史资料选辑》第15期)

今年五月卅一日为黄岩县和平解放三十六周年纪念日。

本刊本期发表毛静如先生的《策动黄岩起义的经过》及王维积先生的《黄岩起义的前夜》两文，以存史实，并资纪念。

朱焯先生系当日国民党县政府县长，率部起义，历经艰苦。后回缙云原籍任人大常委。昨据缙云来信，朱先生亦已作古。于此，致以悼念！

本刊编者

1985年5月

策动黄岩起义的经过

毛静如

作者简介：毛静如先生，别名镜仁，生于1892年，本县城关镇人。1916年（25岁）下半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次年分发在浙江陆军第一师炮兵团见习，1918年随炮兵团调闽候差，不久因病调回杭州任少尉排长，训练新兵。后调第二师炮兵队任中尉排长，驻防金华。至1924年孙传芳入浙，第二师全部溃退而脱离了部队。迨后陈仪调长第一师驻防徐州，毛先生又转入第一师任上尉参谋。1927年经保定军校同学介绍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参谋厅任中校参谋，1928年该厅改为参谋本部，升上校科长，主办兵要地理。一九三四年暑期考入陆军大学，以原职原薪入学，直至1937年“七·七”事发，回参谋本部服务，同年底随部退至武汉。

1938年初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后任第一厅少将处长，主办部队调遣工作。1938年底退至桂林，因病辞职回家，从事商业、医务，直到解放。其间于一九四四年农历正月至四月底，应台州专员杜伟之请，在杜伟赴重庆受训期间，担任台州专员公署护航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代表杜伟同各方面联系进行收抚海匪王仙金的工作。1945年十一月至1949年五月任黄岩县绥靖委员会（四七年改为勘乱委员会）常务委员。

解放后，曾任黄岩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席、黄岩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黄岩县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七四年病故家中。

大概在1949年农历的三月底或四月初的某一日，朱劼成差人约我到他家谈话。到时，除主人外，有路桥的徐聘耕和塘角桥的杨士宣在座，徐首先向我说，现在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同志，向我们接洽解放黄岩事，你的意见怎样？当时我就说，在原则上是同意的，但不知事实已酝酿到如何程度。徐说，尚无头绪，现在正约定双方到郑敬复（住大湫巷）家谈话，你我几人同去如何？我说可以。就即到郑敬复家，坐待未几，本城西门人方圣浩突然来到，我很奇怪，后才知道所约地下工作的同志就是他，大家作了初步交换意见而散。散后大家对对方并不重视，同时也怀疑他能否负得起重要任务为虑。

在当年的阳历四月二十日，和谈破裂以后，接着南京就解放。东南各省大为震撼，当时伪县长朱卓亦同样感到不安，屡欲辞职，脱身远扬。我同朱劼成（朱任伪县长，是我同朱劼成极力向省方要来，预计在局势剧变时，扭转黄岩转变的布置）常以私人关系打消他这种消极的动机，劝他勉为全县人民谋幸福。彼此虽未说明心曲，但俱已默契，至是我即将当日与方圣浩所接洽情形向朱进一步试探，朱亦毅然认为原则上同意，也以方圣浩担负这种重大工作未免怀疑。过后随即将此种情况反应到路桥郑国森同志，因郑当时是借路桥一利酿造厂会计名义，隐瞒身份进行工作的。

大约事隔一星期左右，朱劼成之子朱有玠在一天傍晚到我家，说是刻有一姓徐的在双桂巷卢英逊家约我谈话。我即同有玠到卢家时，徐德同志正在晚餐，见我即到吐哺与我聚谈，大约谈了些目前形势及新民主主义精神，交换了意见，彼此很相投契，遂约定当晚邀同朱焯到朱劼成家商谈。我即别徐来约朱卓，并告以此番与徐德谈话投契的情形。朱说此时此事，必须与吴锦伦说明（吴是伪自卫队副总队长），共同合作，他并说，好在吴的情

形我很了解（吴锦伦是朱卓一手提拔的）。朱遂召吴前来，告知目前情况，并征得同意后，遂相偕同到朱卓成家。经向徐介绍后，始则双方漫谈些目前形势与共产主义政策，继则进一步交换意见，最后就谈到具体问题，徐同志要求朱卓将黄岩现有的武装人员及武器弹药和各仓库存粮并现有数量等，尽速作成书面报告，并嘱朱须切实保存档案，更约定今后通信联络方法等，畅谈尽夜，情绪甚高。此后，朱也对徐要求一一照办，彼此联系，均由朱有玠任传达任务。

大约再过旬日左右，朱卓突接伪省方撤职命令，新任袁悟农接替。当时我与朱韵成共商挽救办法，闻王云沛现任伪浙东行署主任，已专轮驰抵海门，即商谈约西乡陈荣楫（陈是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与我是同学关系，与王云沛是同事），赶赴海门，力图挽救，请王云沛收回成命，仍由朱卓暂长黄岩。迨当陈抵海门时，而新任袁悟农所率领干部约七八十人（都是淮海战役收容下的干部），携带新式武器，已到黄岩，事已无可转旋。于是，只得转劝朱卓，仍暂留黄岩，暗中策动完成艰巨。因朱对当时伪自卫队及伪警察，均尚能掌握故也。

陈荣楫此行，虽未达成目的，但已侦悉王云沛此番进驻海门，是有计划地想扩展台州游击组织，以淮海战役收容干部为基础，以台州为游击区，以盘安为核心据点，进行最后挣扎，负有重大任务而来，于是益促成我们加速进行解放黄岩的决心。

距起义前约一个星期，值朱卓已将县事交卸之际，徐德匆匆由天台赶到，住在朱韵成家，即遣有玠邀我商谈。到时，徐一人独住在朱家楼上，相晤后，徐先讲大军刻已南下，先头部队已到达天台，次提出今后如何进行解放黄岩与招待过境大军两大问题。彼此展开密商，决定关于起义事由朱卓负责，即须邀朱商讨，关于招待大军事，必须发动地方群众，目前掌握地方势力的，是伪党团，党方卢奇琰是死硬派，是坚决反对到底的，无从争取，只有团方王维积，颇想靠近人民立功赎罪，尚可利用。适其时王维积正在楼下与朱韵成谈话，就邀他来逐步探问，最后责成完成任务，王当时坚决表示愿誓忠效力。遂将招待大军事囑王暗中筹画布置。朱卓旋亦到来，商谈结果，朱亦表示决心完成艰巨。当夜即将讨论结果由徐德出名向上级报告，由朱卓负责设法拍出（由于这时的伪政府无线电台已由袁悟农接收掌握）。

第二日，我遂约同王维积，并邀柯友三（本城电灯公司老板）、许尔纯（住孟家巷，现管制中）等，商讨如何招待大军的组织和分工合作的办法，并由王维积负责暗中发动布置。

到了起义这天的前夜（即五月二十八日，是农历五月初一夜），正大雨滂沱之际，朱倬王维积至我家，说本日接到浙南方面（当时黄岩地下工作分浙南、浙东两部份，我们是与浙东方面取得联系）来信，约朱倬在二十九日派一全权代表至小坑（据考证，不是小坑，是茅畚——本刊编者），与浙南代表指名陈清波者商谈和平解放黄岩事，对于代表人选问题，即须今夜决定云云。正为此事设法推派代表，并起草介绍信时，大约在当夜九点多钟时候，卢英逊（住双桂巷）与朱有玠冒雨来到，传达路桥郑国森同志派来路中同学转来消息，说温岭县已于本日解放，刻下浙南部队已分两路向黄岩前进等语，当以事关紧急，就搁下派代表事，即讨论如何应付目前的新情况。当夜在座的有伪县长朱倬、伪自卫队副总队长吴锦伦（续后邀来）、伪三青团干事王维积、黄中教师卢英逊、朱有玠以及宁溪士绅陈荣楫（为推派代表时邀来）及本人共七人。讨论结果，金认为时机业经成熟，决于明拂晓前起义。所顾虑的，其时徐德同志不在黄岩，此间经过情形，尚未与浙南部队取得联系，于是决定于明晨起义后，立即派得力干部二人，持朱倬名片分两路迎接浙南部队，说明经过，免致误会。万一在起义中途发生挫折，亦可获得浙南部队支援。决议由朱倬、吴锦伦负责先解决由袁悟农带来干部。由王维积、卢英逊、朱有玠负责发动学校群众并宣传。于是朱、吴立去集中驻扎近郊武装部队，大家亦遂散去，分头进行。

至当晚一时左右，朱倬又只身潜至本人家打门，报告队伍业经集中完毕，但他总对路桥传来消息，是否真确，还有顾虑。我当即即解释，说明此事不许吾人再事游移顾虑，尤其是你（指朱），今晚既已移动部队，明日必被袁悟农察觉，到那时，非唯前功尽弃，吾人均无鳃类矣，处境何等危险。至是，朱意始决，拔步而去。我在家坐等个把钟头后，即闻伪政府附近枪声轰起，初甚激烈，不久即停歇，绝无还枪对抗枪声，逆料此事已胜利完成。

五月二十九日即起义之日拂晓，朱倬遣人来邀我，我即至朱倬寓所（在行书巷江家），到时，朱即首先问我，“歼已杀倒”，此事如何料理。我问：“伪县长袁悟农有否看管？”曰：“未，前后同事，殊难为情”。我说：“此时已成敌我对立，如何将他首要人物轻轻放过”。朱立即遣人去看管，詎袁已出县府，潜至直下街，遂于途中扣回。当即一面由学校发动宣传，游行示威，最后列队南门外，欢迎浙南部队，同时调动县武装部队，开至山下郎三港口附近，向海门方向及沿江警戒，并杜绝黄椒交通，当日浙南部队未到，部队谣言蜂起。第二日又迎候一日，仍未到来，于是人心更为惊惶，加之当日适值由乐清北撤之伪军王辅臣团，开抵路桥，于是社会谣言更多，反动分子从中推波助澜，人心益不安。幸

王之伪部，原系惊弓之鸟，漏网之鱼，达路桥稍事休息，亦即匆匆向海门溃退。于是一日虚惊，至是稍稍安定，迨夜，徐德同志赶到，即筹组维持社会治安机构，时浙南陈清波同志亦已到来，即推陈任临时维持委员会主任委员，即以当时暗中组织招待大军各组办事人员为委员，出示布告安民。

第三日晨，接海门电话，获悉王云沛闻黄岩解放，伪县长袁悟农被扣，知大事已去，遂于昨晚乘轮逸去，停泊在海门关外桃渚东面海上待机，而我浙南部队周丕振部，才于当日开到，遂由人民政府前政委黄义桃同志暂以黄乐县长名义主持县务，黄岩起义解放事，至此始告一段落。

先是，黄岩原约定与温岭县同时起义，因温岭县伪县长卢某，亦同朱卓情形一样，在临起义前几天被撤换，而新任伪县长当时率领着伪水上警察部队约六、七百人，星夜驰赴温岭接替，因而浙南北上部队，因温岭抗拒，发生战事，致迟延数日到达黄岩，幸王云沛等均系惊弓之鸟，望风即靡，否则，当时地方仍不免遭受一番蹂躏。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

黄岩起义的前夜

王维积

……（1949年）北平和谈的消息在报上看到了，当时多数人的看法：这次和谈定能成功，因为共产党的军事发展太快了，可将力量放到解放区的建设和各种干部的培养上；国民党接连吃了败仗，喘息未定，人心士气都证明不能再打下去，不会有象“双十政协”那样的后果。我们几个人在地方发动组织一个和平促进会，朱议长和我及毛静如与那时的县长朱卓等数人，决定不管将来时局发展前途如何，黄岩决定要贯彻和平的主张。因为我们预料解放军的正规部队一时不会到黄岩这样小地方来的，将来时机迫切时，一定由共产党的地方武力负责解决。只要我们适当地处理，有可能避免地方流血，减少人民苦痛。我们主张已定，却严守秘密。当时分别和浙东、浙南地区人员及有关的联络工作人员分头接洽。

到四月底止，一切已有头绪，但那时台属的（国民党）驻兵增加了，（国民党的）浙东行署进驻海门，各种临时组成的部队，如反共救国军、青年救国团之类，先后在临海、

海门一带成立了不少。接着在五月中旬，省府调动黄岩县长，我们电请挽留（黄岩县长）朱卓无效，事先准备的工作，到此将有更大的变动。我们留着朱卓在黄暂住，以便共同商量。在五月中旬，我和浙东政治工作团团长徐德（解放后曾充海门区长）见面，他要我负责准备：一旦解放军到达时的驻所、粮食、慰劳和临时开支经费，以及对各乡镇的联系，在人民政府成立前的组织地方办事机构等工作。我一一为之准备就绪。

五月廿七夜，我冒着大雨去看朱卓，他不在家，却碰到那时县里自卫总队的副总队长吴锦伦及其表弟黄美明。他将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周丕振的来信给我看，我们约定到城北毛静如家中去，以便好好商谈。我们到了毛家商谈决定，首先派车乘义到西乡和周丕振的代表陈清波见面，并由我拟好信稿复周。到九时许，黄岩县中教师卢英逊、朱有玠二人来找我，当出示郑国森（解放后曾充路桥区长）的来信，并告我以郑君给我的信不便写明，要路桥中学的学生来面告，希望次日起义，以便促成台属各县的早日解放。当时我们就决定：立刻由吴锦伦将分散各乡的军队全数于当夜赶回城区，并于当夜到城后再行决定布置，便于明日宣布起义。我们反复讨论到二时以后才回家。到四时许，城内枪声已起。四时半左右，朱卓便来找我。因为吴锦伦及各中队恐次日新县长质问何以没有他的命令擅自回城发生意外，所以当时即决定将新来的一中队包围缴械并把新县长袁悟农扣留。

于是我们一面通知各乡镇安定人心，不得轻举妄动；一面严防匪特活动及海门、路桥（国民党）驻军进攻。当即发动各方准备粮食、款项及慰劳品等，并要各中队士兵坚守岗位，不可惊惶失措。到第二天上午，临海股匪枪击黄岩民船，以致误传海门驻军来黄，人心一度浮动。第三天，徐德来黄，要各中队起义士兵摘下帽徽，以致引起士兵惶恐心理。我和朱卓、毛静如等每日会商种种安定人心的办法，竭力镇定，以待浙南部队的到来。到六月一日，浙南周丕振部才到黄岩，下午一时许进城。我们在县参议会前举行一个欢迎大会，由参加欢迎的七个单位，推定我为临时主席代表致词。接着为了各种事务又忙了好几天，我与周丕振、徐德等也因接洽事务见了数次面，我自问对此次黄岩起义事所负责颇大……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

编者按：

作者王维积，解放前是三青团黄岩分团部干事长、县参议会副议长，现已病故。本文为其自传的节录。

转抄自党史办公室《黄岩和平解放的材料》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直，襟怀坦白，对同志诚恳，满腔热情，在师生中留下良好的印象。当年受业于王琨教授的学生，现遍及祖国各地，已成长为“四化”建设的优秀干部和教师及科学工作者。他的辛勤劳动，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先后当选为二届、三届、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省三届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杭州分社副主委，中国化学会浙江省分会理事长。他不幸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逝世，终年七十九岁。一九七二年十月省革委会在杭州举行追悼会，全国政协、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统战部、省政协等单位及许德珩、铁瑛、陈伟达、游驹等同志送了花圈，王琨生前好友贝时璋、苏步青等也发来唁电、唁函或送来了花圈，以表悼念。

许植方教授史料

许植方教授的治学精神

许植方先生和我于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〇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学，他攻读理化，以长于化学实验闻名。为了得到实验的结果，往往在下午放学之后，还在实验不休。有多次他在实验室内做实验，校工不知室内有人，以为时间已过，把门一锁就走开了。许先生被锁在室内，不能出来。他索性继续操作，做个痛快，直到夜自修时，有人发觉，才叫校工把门开了，他才走出来。

一九二〇年南高师毕业后，所有毕业同学都由学校介绍到中等学校工作。他则别具远见，认为要想进步，须做大学的助教，才是正路，于是他到山东齐鲁大学做助教，所得工资仅能供他自己的伙食费。他不嫌工资之低，一心一意勤勤恳恳地工作、学习。后调到南京金陵大学做助教，那里有美国的教授，书籍又多，学习条件是很好的。有一次他在做分析黄豆成分的实验，照教授所说的方法做，做了几次，没有得到好的结果，找遍各种参考书籍，终不能解决难题。他心中如焚，拼命思索。恰好美国寄来一本杂志，内中有分析黄豆的材料，他照杂志所载的方法试验，得到很好的结果。这些事迹表明他工作的认真和学习的努力，但他不满足于此。后又毅然往菲律宾华侨大学，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回国之后，曾为研究浙江油桐一题，得奖金五千元。

许先生化学程度很高，分析中药防己，超出世界水平，其成果为西德许多专家所采用。有人与他争论防己中所含氢原子的个数时，他把材料寄到东德化验，经东德有关方面回复，证明他分析的结果是不错的。许先生为学博采众长，并常与日本专家教授往来、探讨，其论文也有不少在日本科学杂志上发表。

(王立干)

怀念许植方教授

许老先生是我在中学时代的校长，也是我热爱化学专业的良师。他为人刚直，治学严谨，诲人不倦，我永远怀念他。

一九四四年许老先生第二次出任黄岩中学校长，那时我在高三年级读书，正当国难深重的抗日战争后期，那时学生毕业即失业。我对自己的前途茫茫然，经许老谆谆教诲，增强了我的学习信心，并对化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中毕业后就选择了攻读化学的专业。

解放初，我经营“三八”肥皂的生产，因遇海门“民华”肥皂的竞争，考虑到质量要提高的问题，请教许老先生，他经过对比试验，在含水量、游离碱等方面作出了鉴定，认为“三八”肥皂的质量确实不差，以此广为宣传，打开销路，这种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确是我学习的榜样。也就是在那年的大伏天，我多次看到许老先生仅穿一条白裤，手执芭蕉扇，专心致志地做试验，连小便也不下楼就撒在尿壶里，当时我很受感动，出于关心许老先生的健康，对他说：“许老师，你可要注意身体健康啊！”许老笑笑回答的是“年岁不留人嘛！”许老先生虽离开了人世，但这句话始终在我的心中回荡，鞭策我前进。

更使我难忘的是在许老先生垂暮之年，他经受十年动乱的折磨，自动要求回黄岩原籍定居，自那时起我与他的交往更为密切。我看到他不是伏案疾书，就是在搞化学试验，不仅在搞中草药研究，还在无私地为黄一医、萤光化学厂、向阳化工厂等创制新产品解决技术问题。他对后辈的科学论文中谬误之处，费尽心机，一一作了订正并介绍发表。许老先生对中药防己研究数十年，为了确定防己的结构式对其中所含氢原子的个数尚有疑问，曾提到中国科学院及东德去鉴定，一直还未解决。他翻开美国药学巨著恳切地对我说：“一生研究防己，在外国巨著中都提到我许某这位中国药学家名字，而对防己的结构还确定

不下，该怎么交代？”许老先生已离开人世，防己结构式将因此确定？！

许老先生不但对中草药的研究造诣很深，他对青年学生的成长也极为关怀。他曾对我说：“文革初期看到自己的学生成天在搞‘革命’，不肯读书；要读书，要做试验的，又没有地方，我叫他们到我家做试验，结果这些学生反因不参加‘革命’而受责。教育青年多读书，有什么不好，我到现在还不明白”。

许老先生生活十分俭朴，自回黄后，组织上每月只发给生活费五十元。他坚持青菜淡饭过日子。“四人帮”粉碎后，许老先生得到平反，补发了工资贰万余元，他一直存在银行，舍不得乱花一分钱；尽管当时自由市场可买精白米，每斤也只得几分钱，但许老先生仍然吃统配粮。我笑着对他说：“许老师，你经济上已宽裕多了，身体又不好，可以买精白的米，何必再吃统配粮。”他严厉地对我说：“我一生是苦出来的，生活苦点没有什么，国家配给什么就吃什么”。许老先生啊，您是药学界的巨匠，您是一位秉性耿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您激励我前进，我永远怀念您！

(郑涤心)

许植方先生的一生

许植方先生字鲁瞻，浙江黄岩人，生于公元一八九七年四月。他是我县教育界的老前辈，是我国老一辈的化学家，也是我国植物化学事业的创建者之一。先生幼年（约五岁）丧父，家境贫寒，由长兄当家，兄弟分家后，他随母在城内居住，曾迁徙四次，约在一九三三年，他获得一笔数额较大的科学奖金后，始在锦江桥旧地基，自建楼房三间，置薄田数亩，得以定居。他排行第三，有兄二个，长兄许植中（诨夫），嘉兴蚕桑学校毕业后教过书，后来回黄从事养蚕事业；次兄许植槐（文学），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为人正直，北伐战争时阵亡。许植方年幼时，天资聪颖，发奋求学，一九〇五年进私塾读书，一九一五年县立中学毕业后，因家贫无力升学，曾在黄岩下浦郑初小教过书，积累一点钱，一九一六年到南京，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理化科。当时师范学校是免收学费的，但入学时需交五元钱杂费，也曾向戚友求助，他在校学习以擅长化学实验闻名。一九二〇年毕业后，到山东齐鲁大学化学系任助教一学期，后去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任助教三年。一九二四年十月赴菲律宾，在华侨中学任教，同时又在菲律宾大学化学系深造，专攻植物化学、油脂

化学等专业。一九二七年学成归国，同年三月出任黄岩县立中学校长。一年后至杭州建设厂化验室任技师，负责农业化学工作。一九三一年初去上海，至中央研究院化学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中药研究四年。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九年受聘为交通大学化学系讲师，兼任大同大学化学系教授。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上海沦为“孤岛”，他毅然离开，奔赴内地，转辗任职于福建和浙江两省之间。其间曾任福建医学院药学系教授、英士大学药学系教授、福建北洋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兼教授职。一九四三年回黄岩，二次出任县立中学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赴金华，任英士大学化工系教授。

解放前，他对国民党的军政人员贪污腐败，深感痛绝，对共产党深表同情。就我们所知，有两件事，很使人钦佩。第一、一九二七年，许植方先生在黄中任校长时，当时他有一个旧同事，在海门任教，是共产党浙东地下工作人员，政府正在通缉，他得到消息后，乘夜赶到海门，要他迅速离开。第二、他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期间，每到周末，经常约几个至亲好友来家打麻将，其中一位最熟悉的是恽子强同志（在某医学专科学校任教，是恽代英烈士的胞弟），当时是上海共产党地下工作组织领导人之一，子强同志妻子早故，并遗有子女，生活比较艰苦，植方先生经常邀请他来家作客，是较知己的朋友，有时党小组开秘密会议，也时常在他家召开。解放后，恽子强出任中国科学院化学部领导工作，曾多次邀请植方先生去北京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做研究工作，他自感年龄渐大，不适宜于北方生活，遂婉言谢绝。从此一直在上海医学院执教，直到晚年。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植方先生受聘为浙江大学药学系教授，兼任华东药专和浙江医学院的教职，奔波于杭州、南京两地。一九五二年因院系调整，他到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任教并创建分析鉴定科，任科主任，当评定为二级教授，担任植物化学、有机分析化学、药品鉴定、药用分析等课程，并从事植物化学研究。一九五四年由组织调动至中国医学科学院担任研究工作。在他垂暮之年，正值十年动乱，备受折磨，体力渐衰，得了风湿症，因生活困难，回黄岩故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政策逐步落实，恢复了他的工作，其关系亦转回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天然药物化学教研室。可惜在科学的春天到来不久，植方先生不幸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因病在原籍去世，终年八十五岁。

许植方先生一生从事药学和化学教育事业，讲授过有机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分析化学、工业分析化学、药物分析化学、油脂化学和植物化学等课程，编著过各类教材。教学工作中十分重视实验操作。抗战期间，条件万分困难，他以自己从上海带往内地的化学药品，配制试剂，放在皮箱中，随身携带，开设有机分析化学实验课，供同学实验、解放初

期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工作，当时设备较简陋，学校所在地区尚无煤气供应，他率领组内教师开设植物化学实验课，同学们用炭炉子加热进行生药材料的萃取。他不辞艰辛多年致力教学，为新中国的药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材，他的许多学生现已成为各方面的骨干力量。

许植方先生在从事教学的同时，还把精力放在中药研究上。由此发掘药物的有效成分不少。早年他曾从治疗风湿病的中药汉防己中分离出汉防己甲素（汉防己碱）和汉防己乙素（防己诺林碱），于一九三五年获得科学奖。经他研究过的中药材有汉防己、木防己、木通、山扁豆、茺蔚子、使君子、海人草、土青木香、槐花米、槐英、青风藤、鸦胆子、远志、鹤虱、仙鹤草、土槿皮等，获得的化学成分有生物碱、黄酮、萜类、多元醇、油脂等。这些科学论文先后发表在《科学》、《中央研究院集刊》、《中国化学会会志》、《化学学报》、《药学学报》、《化学世界》、《医药学》等期刊上，共三十余篇，在日本化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备受日本化学界人士的赞扬，这是士渔在上海与先生共同生活时亲眼看到的。除了中药研究外，早于一九二四年尚对黄岩桔、浙江各县的甘蔗、桐子和中国各地的天然漆成分作过调查和分析，其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许植方先生的一生是在实验室度过的，可谓手不离烧瓶，对化学科学研究工作，真是废寝忘食，记得我们在上海一起生活时，每逢春节全家团聚欢乐时，他总是一人在实验室中默默工作。他经常说：“实验室就是我的家”。到了晚年，在家庭卧室之中，还在提土槿皮等药物的成分；同时对家乡的工厂义务给以技术上的指导。他曾帮助向阳化工厂的甲醇钠原料试验，又对萤光化学厂的涂铜光亮剂试验，并对头陀生产的板兰根注射液的成分进行分析等。他以最后的光和热，贡献给科学事业。一九八一年士渔从沈阳回家探亲时，他不幸已病瘫在床上，行动饮食都十分困难，那时已是八十四岁高龄了，当时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他要士渔打开一箱满装科研著作的箱盖，只见满箱子的手稿，他对士渔说：“这是我一生研究的心血，希望你转交给我的儿子好好保留”。这是他留给下代唯一的遗产，是一份最珍贵的遗产。

许植方先生是一位个性耿直而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在生活上，一生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他那种热爱科学事业、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毛士渔 应启明）

编者注：本篇在审稿时，曾参考潘德济先生写的《怀念植物化学家许植方教授》一文。

忆植方公二三事

一、兄弟兴家

植方公的祖居是黄岩峰江山后许。他的父亲许润化迁到城关居住，约于一八九二年逝世。留下植中（我的祖父）、植怀、植方三子，由长子植中（才十六岁）担负当家重任，靠十多亩田的产业维持一家生活。后兄弟相继长大，植中就读于嘉兴蚕桑学校，二弟植怀进保定军官学校。植中毕业回家创办桑园养蚕、养鸡，当时植方年小就帮助兄长担鸡、采桑，谁知经营不善，弄得蚕死鸡瘟，事业失败。植中只好靠教书谋生，植方也勉强入学读书。那时一家度日维艰，变卖田亩以济家用。太祖母为卖田心疼，对植中说：“如此卖田维生不是办法，还是将老三（指植方）送去学生意，也可以减少家中开支。”“不，弟弟读好书，将来有成就，对我们都有好处。”当时，植方也说：“我日后好了，总不会忘记你兄嫂对我的一片苦心。”于是，植中就下决心，培养三弟读书。由此，植方公常说：“做子孙的，要无愧于祖先，可不能忘记祖先的创业啊！”他亲笔写了一张许氏家谱表给我保管，用以缅怀老人。

父亲曾告诉我，有一年，植方公应朋友之邀，去菲律宾华侨学校任教，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很低，中国人受尽洋人欺侮。有一次洋人调戏了该校女生，植方公激于义愤，聚了学生，围攻了洋人，从此放弃了优裕待遇，毅然回国。他真不愧为铮铮铁骨的炎黄子孙。

二、植方公是我辈敬老爱幼的楷模

自从我祖父迁居路桥石曲后，家中子女多，生活艰难，太祖母只好由植方公一人赡养，身后丧葬都由他料理，从无怨言。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他得知其母坟墓被挖平，他毅然独资重新修复。他说：“祖先的尸骨暴露是极不文明的，修复祖坟是子孙应尽的职责。”在他身体严重伤残的情况下，仍一年一度祭扫祖坟，缅怀先人。

植方公的勤俭节约是出名的，单就他的衣着看，是非常朴素的，经常买些旧衣服穿着，他总说：“这是物尽其用。”当我父子俩生活较困难时，他曾三番二次由上海寄来旧衣给

我父御寒，并隔月寄给我父亲生活补助费。

我的大儿子（他的曾侄孙）结婚，他老人家特意将人家送给他庆寿的空白轴联，要我去请人写上婚联，作为贺礼。这件事情的本身包涵着多么深远的意义啊！

植方公的一生是铮铮铁骨、光明磊落的一生，永远值得我们晚辈学习和怀念！

（许健武）

感谢许植方先生对我的帮助

许植方先生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十年内乱时，他自费添置的价值万元的仪器、书刊等一扫而光，无法再在上海医学院搞科研了，于一九七四年回黄岩故居，而户粮关系仍留上海，让他的学生代领，寄黄由我转交。

许老先生回家后一直埋头于科学研究与实验。一九七七年我因工作需要，有幸与他接触，向他请教。他那种严格的科学作风和坚强的毅力很使人感动，他在简陋的住房里分隔一半作为实验室，坚持对橙、碱的研究与实验，对结果的综合利用进行试验。尽管他的右手手指残废，握物抖动，行动艰难，他仍坚持亲自动手。我有几次想代力，但都被他婉言谢绝。我厂（向阳化工厂）生产的甲醇钠原料，想自己制备，但难度很大，又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我经常到他家请教，他老人家总是热忱地接待，耐心地讲解。在实践过程中他生怕我对制备甲醇钠的操作没有理解，就亲临现场作指导，当我们架设的仪器与他的要求相符合时，他才放心。因他年迈多病，行动不便，来厂指导较困难，我们就用三轮车接送。经多次实验终于成功，后成为我厂的主要产品。

最使我难忘的，他谆谆教诲要我学点外文，经常对我说：“搞科研不懂外文是不行的。”在他的启发引导下，使我热爱了化工专业，攻读化工书刊并自学英文。我之能成为一名技术员，对我厂生产作出一定的贡献，这应感激许老先生的教导。现在许老先生虽离开了人间，但他高大的形象还历历在目，促使我前进！

（潘 欣）